

# 多重国际体系的视野与战略

陈玉刚

**摘要** 本文认为,在全球性国际体系存在的同时,还有多个其他国际体系存在。我们不能因为来自某个国际体系的压力和批评就导致自己产生沮丧情绪和挫折感。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改革和开放。在制订对外战略时,要考虑到国际体系多重性和复杂性这一客观事实,确立多重国际体系的视野与战略。

**关键词** 国际体系 多重性 国际战略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812 (2008) 05-0006-11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可以总结的经验,如这一伟大实践的名字本身所表明的,从根本上说就二条:一是坚持改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探索,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是坚持开放,融入国际社会,在开放中发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

近年来,在融入国际社会的努力中,我们遭遇了诸多问题,面临前所未有的所谓国际社会的压力,对外开放的战略遇到严峻挑战。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惊呼中国崛起,处处抬高中国,许多人都预测中国在2030年后就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并要求中国承担起相应责任,成为体系内负责任的大国,把苏丹问题、缅甸问题,甚至气候变化问题、国际贸易谈判问题,都算作了中国应该担负的责任;另一方面各种国际压力又扑面而来,知识产权、人民币升值、反倾销调查、产品质量安全、主权财富基金、温室气体排放,等等。这些问题和压力不禁让人疑问,我们做错了什么吗?我们进入了一个怎样的国际体系?

问题出在哪里?从某个角度来看,问题出在我们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认识上出现了一个误区。国际体系是否就只有一个,全球一体的?国际社会的成员有哪些,谁代表着国际社会?某些国家舆论的批评,是否就意味着我们的开放融入战略出了问题,或者说我们自己做错了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在问题和压力面前我们所面临的思想困惑。这个困惑解决了,我们今后的开放步伐就会走得更坚定,更有长远的战略性。

## 一、国际体系的概念与历史

世界上不只一个国家,这是不言自明的。一些国家根据一定的规则互动而形成的一个国家体系,就是国际体系。

受世界历史发展全球化的影响,当我们谈到国际体系时,往往把它设想为一个全球一体的体系,全世界就只有一个国家体系,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尤其如此。因此,融入国际体系这一命题也就不需要再进一步明确融入的是哪个国际体系,怎样的国际体系。

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表明:国际体系往往不只一个,而是可以同时存在几个。

古代的历史当然不用说了,全球被分割成许多地区性的国际体系,而这种体系在很多地区会以某个帝国为中心,或者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所说,帝国自成体系,一个帝国代表

了一个体系。<sup>[1]</sup>同时，一个帝国也往往代表了一种地区文明。这里的例子有东亚的中华帝国，欧洲的罗马帝国，中东的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而且，从世界历史看，帝国体系存在的时间比当今民族国家体系存在的历史长得多。如果仅按照时间长短来衡量，帝国才是人类文明的常态，民族国家的体系只是人类在近三、四百年逐步冲破帝国体系发展的一个现代结果。

近代以来，欧洲的地区性体系由于制度创新而获得了扩张性的力量，不仅率先建立了民族国家，还开始对外殖民，建立殖民帝国。这样，在欧洲自身独成一个体系的同时，各个殖民帝国又是一个小小的体系。欧洲体系内部开始逐步适用主权原则，以及主权国家互相平等的原则，但殖民帝国内部实行的又是古代帝国体系的等级制结构，殖民地和附属国被认为不具备足以和欧洲国家一样享有独立主权的文明程度。

美国独立后，这个新生的国家一开始就显露了莫大的国际野心，不仅不参与到欧洲的体系中去——这是国父华盛顿在从总统职位上离别的时候告诫美国民众的，而且还提出门罗主义，要把整个美洲变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宣称美洲是美洲人自己的美洲。虽然美国从未完全掌控过这个体系，美国还是遭到了很多美洲国家的排斥和抵制。美国的想法是它可以搞个独立的体系，这个体系代表着新世界，不同于欧洲的老世界。

在欧洲殖民和源起欧洲的资本主义扩张下，分隔的地区性体系间的藩篱逐步开始被打破了，至少在经济上如此。原先的地区性帝国也纷纷瓦解，如欧洲的奥匈帝国、土耳其奥托曼帝国等。之后欧洲建立的殖民帝国也开始被推翻，先是在美洲，然后到亚洲和非洲，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全球性的体系逐渐开始形成，并有了其标志性的组织：即一战后的国际联盟和二战后的联合国。不过，事实上真正的全球性体系并未建立。一战结束后，美国没有参加自己力推建立的国际联盟，欧洲也对外部新世界的崛起视而不见，继续内部自相竞争，并一步一步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冷战迅速爆发，国际体系至少被分成了二个，即东方阵营和西方阵营。1955年的万隆会议又标志着，两个阵营之外出现了第三种力量，那就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虽然由于受殖民历史的影响在经济上很难自成体系，南南合作成果有限，但政治上还是有其比较明显的体系性，例如77国集团一直是联合国中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力量。

冷战结束后，全球主义者高歌猛进，认为全球化的力量取得了胜利，全球性的国际体系真正形成，全球治理可以在不否定民族国家的前提下形成没有政府的治理，但事实上情况并不完全如此。

首先，冷战的结束被西方国家看成是他们的胜利，因此全球性的国际体系就变成了，或者说应该是他们的国际体系。他们就是国际体系，把持着国际体系的合法性，代表着国际社会。福山也可由此宣告历史就此终结，没什么意识形态比民主自由主义更好的了。<sup>[2]</sup>因此，华约没有了，但北约可以继续存在，并不断扩大。因此，撇开联合国不谈，对体系运作有着重大影响的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还是控制在欧美国家手中。包括今后可能影响全球发展的其他重要领域的全球性治理组织，如国际法庭，还有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如果能最后形成一个全球性治理组织的话，那也会控制在欧美国家手中。这种控制既有人事组织上的，也有规则制订以及话语权上的。而实际的情况是，无论从世界人口来看，还是从国家数量来看，美欧所代表的西方实际上仅占小部分。

其次，很多人都承认，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匀质的进程。上世纪九十年代，许多人都惊呼，非洲几乎成了被世界遗忘的角落，成了被边缘化了的地区。只是到二十一世纪之后，特别是

中国被外界认为崛起之后，看到中国与非洲关系的迅速发展，非洲才突然一夜之间似乎又变成了“香饽饽”，无论欧洲还是美国，甚至日本、印度都强调非洲了。这也就是说，全球化其实并没有把世界所有地区都纳入进一个体系中。而与非洲曾经被遗忘相比，美国和欧洲却一直是互相直接投资的第一对象，双方各自的海外利润有一半是在对方实现的。

再有，在全世界民族国家化的同时，欧洲却开始了建立新体系的探索。这个新体系就是区域一体化的体系。撇开是否已经超越民族国家的争论不谈，欧洲的体系与当前国际体系运行的主要原则不一样，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欧洲当然是当前国际体系的主要参与者，但它也在构建自己独立的体系，而这个体系与外界的界线还相当森严。在内部实现了无边界流动的同时，其外部边界之墙却越筑越高。这一点只要看一下移民问题一直是欧盟讨论的主要问题，而且欧盟打击非法移民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就可以知道了。而且，欧盟也在向外扩张它体系的影响力，如其之前签订的洛美协定，以及眼前法国总统萨科齐上台后推动的地中海联盟构建等等。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国际体系其实不只一个，历史上如此，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今天也是如此。

## 二、国际体系的多重性和复杂性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最近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美国的单极时代已经终结了，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关系属于“无极”时代，国际权力不是集中了，而是分散了，民族国家的影响力在衰落，而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在上升。<sup>[3]</sup>

美国的单极时代难以持久，这是对的；国际权力出现了分散，这也是对的。但是，国际权力并没有从民族国家分散到非国家行为体身上，而是从霸权国分散到了几个国际体系中。由少数国家组成的小集团，或者说小体系把持着整个全球体系的状态遭遇了挑战。

多极化是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发展趋势，它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终结了国际权力向霸权国或少数几个国家组成的集团集中的趋势。同时，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扁平化是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发展的另一个趋势。

国际关系扁平化主要表现在：国际权力并没有完全、明显地出现像通常我们所认为的几个极集中，而是开始分散到几个可以明显区分出来的国际体系中，国际体系出现了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征。与多极化中几个极可以互相清楚分隔不同的是，分享国际权力的几个国际体系是互相交叉和部分重叠的。

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强力推动下，国际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特征在加强，联合国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但没有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下降，反而在进一步发展中的全球性国际体系中的位置越来越中心，地位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发展中心的转移和分散，国际体系不再只是一种声音，一种价值，一种力量。

罗伯特·库珀把国际体系分为现代的、后现代的和前现代三类。<sup>[4]</sup>环顾当今世界政治，可以说欧盟政治属于后现代的，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超越民族国家范式的发展。这种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以国家为单位的相互竞争的地区秩序，被罗伯特·卡甘称为天堂。而卡甘断定，欧洲之所以能生活在天堂中，是因为他们有了美国权力的保护。<sup>[5]</sup>这也就是说，具有后现代性的欧盟体系实际上只是寄生的，缺乏了前提可能就无法自己生存。且不论欧洲这种后现代的区域性政治秩序能否独自持久永续，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它的体系属性具有后现代性，与现代体系不同。欧盟之外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政治仍然是现代的，就连当今世界实力最强

大的美国，其国际政治仍然是现代的，任何对美国主权的约束都被视为无法接受。民族国家及其国家主权是现代政治的基本范式。此外，当今世界也有一些前现代政治的遗留，美国的托管地就明显属于这一类。当然，前现代的体系在当前的影响可以视为零，但某种向前现代回归的趋势的影响力在当前世界政治中不容忽视。而当前世界政治的竞争主要是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进行，美国和欧盟经常被视为这两种秩序竞争的代表。

库珀的划分其实只是国际体系区分方法的一种，其划分方式是垂直的。另一种垂直式的划分方式可以按发展程度来区分，这里至少可以被分成发达国家体系和发展中国家体系，或者中间再加一个新兴国家体系，“金砖四国”就可以算是新兴国家体系。当不久前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四国外长第一次在联合国框架外会晤于俄罗斯时，许多媒体惊呼在 G7 或 G8 外出现了 G4，或者今后全球经济不再只应由 G8 主导，而应是 G8+5，或者是 G13。“金砖四国”由于其发展阶段的相似性，对国际关系发展的认识和主张也有很大的共同之处。在全球经济的发展、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联合国及其他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建设等问题上，除了八国集团的主张外，“金砖四国”的意见也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对国际关系发展的主张和要求各不相同，新兴国家被看作是对发达国家国际权力强有力的挑战者。这里挑战的不只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有模式、道路和价值观。因此，这里的体系划分依据虽然只是经济发展的程度，但其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则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畴。而且，不同发展程度国家间的斗争也会非常明显，如近来在粮食价格问题上，发达国家认为背后的推动因素是新兴的发展大国对粮食的需求增加了，而发展中国家、包括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则认为发达国家的新能源战略是重要原因之一，它们炼制生物油消耗了大量的粮食。

国际体系还可以从横向来进行区分，国际关系多极化是国际体系横向区分的一种笼统说法，国际关系的区域化则是地理区位更明确地另一种区分方法。说多极化的提法笼统，是因为哪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算作一极还很难严格界定，大家用得最多的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美、苏、欧洲、中国和日本这五大力量中心的提法，而且这些不同极力量的大小、发挥影响的方式很不相同。相比之下，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方兴未艾，除了欧洲一体化继续深化和扩大外，拉美一体化正在不断推进，东亚、海湾地区、非洲的各个地区，都在探索符合自己情况的区域合作之路。这些区域性合作体系在今后的国际大体系中其各自的标识会越来越清楚，意义和影响将更深远。

文明或文化其实也是国际体系区分的一个标识，只是由于亨廷顿把这个问题错误地推向了一个极端，得出结论说今后的国际冲突主要是在不同文明体系之间发生，才使得人们对文明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谈论变得非常谨慎了。取代文明或文化的是，认同问题在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讨论增加了。其实，集体认同的构建背后起作用的主要还是文明或文化。撇开现实政治的考虑不谈，同文明国家的社会间比不同文明国家的社会间相对具有更大的亲和性，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当文明体系与区域合作体系叠合时，体系间的互相区分性就会更明显。如在欧洲认同的讨论中，争论得很厉害的是是否要把基督教确认为欧洲特性的组成部分，与此相关的则是应否接纳穆斯林大国土耳其作为欧盟成员国。而相比之下，南亚的区域合作却不太为世人所看好，因为人们很难想象分属不同文明体系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会在同一地区体系中合作。不管同不同意亨廷顿的观点，文明体系在国际大体系内部仍然会存在，并以各种方式发挥作用。亨廷顿的错误主要在于，他把冲突当作了不同文明体系间作用的主要方式，而实际上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和对话才更是当前世界发展的主流。

在一定程度上,价值体系在国际体系中也是存在的。同亨廷顿一样,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些教授也把这个问题的极端,搞所谓的民主价值联盟,甚至试图以此来替代联合国。且不说西方国家自己民主模式各不相同,小布什八年的外交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不但美欧西方民主国家没有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保持一致,而且小布什的民主改造中东计划也在濒临失败边缘。民主、平等、自由等是人类普遍的价值,不是几个国家可以攫取的私有之物,而把这个小集团之外的国家都归为非民主国家。我们这里所指的价值体系更多地是指对重大国际问题的基本看法和立场,或者说是对一些国际关系重要原则的态度。例如,在缅甸救灾的问题上,就出现了法国等叫嚷要强力介入,与东盟在尊重主权基础上平等友好协商之间的价值对立。今后的国际体系中,在国际制度、环境、人权、国际法、自然灾害救助等诸多重大问题上,价值的分歧仍会继续存在,并时而可能矛盾激化。反之,许多价值上的矛盾和斗争,其背后可能反映的就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国家利益之间的争夺。欧盟在环境问题上所制订的排放标准,表面上宣扬了保护环境的人类价值,而实际上同时也排挤了许多不符合欧盟标准的境外竞争对手,不要说别的国家,美国的航空业对此就保持高度警惕。

这些不同的发展体系、区域体系、文化或文明体系、价值体系相互之间又交叉重叠,从而加剧了国际体系的复杂多元性。这些体系如果重合度高,那么体系的体系特性就会越明显,体系就会越紧凑和稳定,欧盟就是如此,不但地理范围表明了其体系的存在,而且其文明或文化、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程度的接近、所持价值的雷同,所有这些都使得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一个区域体系。如果这些体系重合度不高,那么体系就会呈现出比较松散和变动的特性,东亚合作尽管呼声很高,但这一区域合作的范围却有很大的变动性,倒是10+3的名称似乎更具有东亚的代表性。

国际体系这种复杂多元的特性在当今的国际关系发展中趋势已经显现,国际权力会在这些体系之间呈水平分散的状态分布,但整个国际体系的发展又不会走向这些体系的对立化,因为这些体系又是交错和部分重叠的,新兴国家体系就不存在地缘上的集中性和文明的同一性,但它却是不同地域、不同文明国家间对话合作、共同推动全球问题解决的体系模式。国际关系应该会在逐步认识到国际体系的多元性,尊重国际体系多元性的同时,加强多元国际体系之间的对话和合作。在国际体系多元化发展的过程中,国际体系的整体化也会得到促进和加强。

### 三、多重国际体系的战略

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是需要社会性的,而社会性意味着一个国家至少应该在一个国际体系中生存和发展。非武力国际制裁的实质,也就在于剥夺一个国家的国际社会性,迫使这个国家处于孤立封闭的状态中。有人说,强国不需要外交,其实错了,就连强到被称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也不能承受因伊拉克战争而失去欧洲盟友的孤独之痛。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国家也天生就应该存在于国际社会中。

联合国的会员都享有基本的国际社会性,拥有基本的国际社会权利,这是全球性国际体系所决定的。同时,国际体系的多重性又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到国际体系的复杂性,制订相应的国际战略,提高和增强国家的国际社会性。

十六大以来,我们明确了大国是关键、周边国家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这一总体外交战略。这一外交战略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我们应该如何在多重的国际体系中自我定位,并制订了相应的行动战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实际上只是如何在这一总体外

交战略的指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各种束缚，明确多重国际体系的对外战略，构建和扩大我们的国际体系资源，以更好地为我国总体的改革开放战略服务。

对国际体系多重性的判断破除了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的认识误区，看到多个国际体系存在的现实或发展趋势。在地域上决定了我们是亚洲国家的同时，发展程度上确定了我们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新兴国家体系中的一员，而价值上决定我们是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拥护者和坚持者。以上是我们三重最基本的国际体系属性，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国际体系战略基本目标是实现这三重属性所赋予我们的任务，发挥相应的作用。

不要让所谓世界统一的规则或主流的世界话语变成我们思想和行动的禁锢，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来开展对外工作。许多貌似具有普遍性的规则、话语和价值，其实只是某个国际体系的属性，对于非这一体系成员的国家，理论上不具有遵守和贯彻的责任。当部分国家舆论指责我们在非洲的经济活动不考虑人权、善治和环境标准的时候，笔者从在不同场合碰到的一些非洲学者口中得知的是，事实上只有中国的援助和合作项目、销售的商品才最符合非洲当地的实际。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说需要什么，我们比任何西方大国更具有发言权。

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一员，这是我们对外开放一贯追求和坚持的，但这里的国际体系不等同于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要负的责任也不只是部分发达国家提出的责任。国际责任的大小多少更不能由少数国家或某个国际体系说了算，部分国家的舆论和媒体也没有资格代表整个国际社会。不应让只是来自部分国家或某个国际体系的压力改变我们既定的方针、战略、步骤和总体部署。

国际体系多重性还要求国家的国际战略在明确针对具体国际体系的战略同时，统筹兼顾多个国际体系的战略，在全球一体的统一布局中，谋划并运用好不同体系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不为来自某一方面的压力所压倒和改变。

最后仍然要强调的是，主张多个国际体系可以同时存在，并不意味着要回到以前那种体系和体系对立和冲突的状态，融入和加入一个国际体系，同时敌视和反对另一个国际体系。多个国际体系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是和谐共存，共同发展，是一种基于多元性的和谐统一。

### 注释：

[1]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ress, 1994.

[2]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Perennial Press, 2002.

[3] Richard N.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3, May/June 2008.

[4] Robert Cooper, *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and Chao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3.

[5] Robert Kagan,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Knopf, 2003.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08年7月